

主编 吴怀祺 副主编 汪高鑫 向燕南 周少川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宋辽金史学思想卷

吴怀祺 著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主 编 吴怀祺 副主编 汪高鑫 向燕南 周少川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

宋辽金史学思想卷

吴怀祺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宋辽金史学思想卷/吴怀祺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211-07833-2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史学思想—中国②史学
思想—中国—宋辽金元时代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5348 号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宋辽金史学思想卷

ZHONGGUO SHIXUE SIXIANG HUITONG · SONGLIAOJIN SHIXUE SIXIANG JUAN

作 者: 吴怀祺

责任编辑: 郑翠云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7833-2

定 价: 7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中国是个具有重史传统的国家，史学思想博大精深。纵观史学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二是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是指历史观，其认识主体主要是史学家和思想家；对史学本身的认识是指史学观，其认识主体主要是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主要考察历史的变易过程，以及历史变易的动因；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则主要包括对于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观等的认识，以及对于史学价值论和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

史学思想的发生与发展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史学思想的研究也必须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探讨史学思想，必须要与社会现实相联结，必须考察其与时代哲学思潮的关系，必须考察史学思想本身的渊源流变，必须考察史学思想各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史学与经学、玄学、理学、事功之学、经世之学、实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需要具有四部思维意识去进行史学思想的研究，重视探讨经史、子史、文史之间的关系。研究近代史学时，我们还要努力把握近代史学思潮的发展与走向，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近代史学与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

中国史学思想最鲜明的特色是会通精神，这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

征。《周易》讲通变精神，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司马迁讲“通古今之变”，重视对于历史盛衰之理的探究；《通志·总序》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突显了郑樵对历史与文化会通思考所具有的大视野。

近年来，以吴怀祺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本着会通精神，对中国史学思想史展开了长时段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发掘中华传统史学思想特性，思考传统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展现中国史学优秀的民族精神，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两套大型系列学术著作的问世：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和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前者时间上跨越了从先秦时期到1949年的漫长历史，后者内容上涵盖了历史思维、经史关系、历史盛衰、历史文献学思想与历史编纂学思想等方面专题。

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是从纵向对中国史学思想展开的研究，而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则是从横向来专论中国史学思想的相关问题，这种多维研究恰恰体现了会通的思想与方法。从两套系列著作的整体布局来看，前者作为对史学思想史的贯通研究，主要体现“通”的意识；后者作为对史学思想各类专题的研究，则主要彰显了“会”的思想。然而，这种“会”与“通”又是相互包含的，“会”中有“通”，“通”中有“会”。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关于每一阶段史学思想的论述，既是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的重要一环，又有对这一阶段史学思想多维度的探究，体现了“会”的意识；同样，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虽然是专题式的研究，而其中每一专题的研究，又都是采取贯通的方法，重视溯源探流，重视发展过程，体现了“通”的意识。

为了更好地体现《中国史学思想通史》与《中国史学思想通论》所蕴含的会通思想，我们将两套大型学术著作合编在一起，以“中国史学思想会通”为总书名，进行再版。

这样做首先是满足弘扬中国传统史学、回应西方学人扭曲中国传统史学的需要。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史学思想丰富深邃。然而很多西方史家以傲慢的态度鄙薄中国史学，否定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如何回应？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去展示中国传统史学，而是要把历时性的研究和共

时性的研究结合起来，从理论的高度上，概括出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特点与要义，并且结合时代的变化，从振兴中华文化的总目标出发，讨论传统史学如何走向世界，思考传统史学思想在当代的价值。

其次是把握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与时代性的需要。传统史学有很多精华需要我们去总结，如历史运动的通变观、天人相关的思想、见盛观衰思想、民为邦本与民贵君轻思想、传统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论等。史学的时代性同样不可忽视。当前我们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要求我们必须把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讨论中国史学的进程，认识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趋势，讨论历史学科建设问题。

当然，合编与再版不是简单的重印，而是有内容的提升与结构的整合。从内容来讲，各卷作者对原有内容普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订和补充，有些卷补充的内容较多，有些卷调整了篇章。从结构来讲，原来两套书各自的总论部分，被整合成一卷新的《总论卷》，起到了对全书的统领作用。

1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会通》大型学术著作的出版，既表达了学人们对于中国史学会通思想的继承，也充分体现了该书纵横论说中国史学思想的会通特点。传承历史文化，建设时代文化，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任务。我们希望这套著作的推出，有助于加强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深入挖掘中华传统史学所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有助于学界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助于当前的文化传承与时代文化建设，树立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大发展。

2017年10月

原 序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在建设中的学科。从近年发展的形势来看，这门学科还需要历史文献学史、历史思想史、历史编纂学史、历史文学史、史学比较研究等分支学科的建设。关于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可以是断代的，也可以是地域性的；可以是对史家、史书、史学流派研究的专史，也可以是对于一些问题的综合性研究。在表述形式上，除一般的史书史论形式外，还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如《古文辞类纂》式的，《古书疑义举例》式的，等等。这些分支学科的建设，是建设、发展史学的必要手段。吴怀祺同志的这部《宋代史学思想史》，是史学史分支学科中的一部断代史，也是一部专史，正是为适应分支学科的建设而做出的成果。

长期以来，吴怀祺同志对史学史的研究工作富有热情。1964年，北京师范大学招考史学史研究生，他被录取了，因故未能入学。十四年过去了，1978年，北京师范大学再度招考史学史研究生，他再次被录取，并于1981年取得硕士学位，此后就一直从事史学史的研究工作，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先后发表史学史研究论文近六十篇。现在我们手里的这部《宋代史学思想史》，是他多年研究积累的成果。宋代史学著作繁富，抓出个头绪来很不容易，我祝贺怀祺同志取得的初步成功。宋代史学研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希望怀祺同志能坚持下去，做长期不懈的努力，继续不断地获得新的成果。

白寿彝

1992年2月于北京

原题记

吴怀祺

我的《宋代史学思想史》是1992年出版的，到2001年，头尾是十年。这十年，我是一头扎在史学思想史领域内摸爬滚打。1996年，我的《中国史学思想史》出版了，另外写出几十篇史学理论与史学思想研究的文章。为深化对中国史学思想的认识，又用不少力量研究《易》学与中国史学思想的关系；这期间，培养出几届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和访问学者。

在诸多师友和黄山书社同仁的大力支持下，现在我正在着手主编、撰写多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这里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宋辽金卷》，基本还是当年《宋代史学思想史》的框架，本想来一个“旧貌换新颜”，增写更多篇章，但考虑再三，还是没有动手。主要有两点考虑。一，当年那本书是自己的真正读书后的心得，初步经受住岁月的考验，海内外学者对书稿反映还不错。记得1998年去台湾参加史学史讨论会，几位研究史学史、研究宋史的学者，对《宋代史学思想史》的反映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想还是继续让时间去考验已经提出的认识为好。二，这几年研究范围扩大了不少，而在宋代史学思想方面下的功夫，相对来说是少了些。在心得不多的情况下，我想还是不要硬撑着去翻新内容、增扩篇幅。



但《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宋辽金卷》毕竟不是过去作品的重印，还是有新的思考的。这几年在辽、金史学方面做了一些研究，深感辽、金史学内容丰富和深邃，是我们民族史学思想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但要写，而且要把宋、辽、金的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在世界文化发展的背景下思考。

1992年出版的《宋代史学思想史》，重视研究宋代社会与史学、理学与史学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和别的书不大一样的地方；到了这个层次，似乎还不够。关于理学与史学的关系，如果再往深一点思考，就要研究宋代《易》学、《春秋》学与史学的关系。在此以前我就感受到《易》学的通变思想对史学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写出几篇文章；到研究宋代史学时，认识到研究《易》学与史学关联是绝不可少的。《易》学在会通儒释道中的重要作用，是其他经籍不能替代的，因而研究这个专题对于认识理学同样是必要的。《春秋》学直接与宋代史学中的民族思想联系在一起，又直接影响到宋代历史编纂学的变化，成为中国史学思想二重性的表现形态之一。总之，《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宋辽金卷》看似变化不大，但确又反映这几年的史学兴趣所在。

这十年，老一辈学者先后辞世，父亲吴孟复先生是1995年去世的，恩师白寿彝先生又于2000年春离开了人间。而今不少人为了显示自己在学术上的“伟大”，动辄说“某某时代结束了”。对此，我只能哑然以对。我写纪念恩师白寿彝先生的文章，特别将标题写为“永恒的薪火”。

先辈燃烧起熊熊薪火，照之以天光，其业绩成为民族文化宝库中的明珠。文化只能在一代一代传承中向前发展，不会中断，更不可能中断。我也是年逾六十的人了，我当记住先生的话：

不断摸索，要赶紧走上大道。

2001年6月18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励耘七楼

目 录

原 序 / 1

原题记 / 1

导 言 / 1

第一节 宋代史学思想的新精神 / 2

第二节 宋代社会、学术与史学思想 / 6

附 关于宋代易学的传授 / 23

第 一 编

第一章 欧阳修的史学思想 / 35

第一节 北宋的《春秋》学和《新五代史》编修 / 38

第二节 欧阳修的易学、理学和史学 / 48

第三节 欧阳修的疑古辨伪 / 59

第二章 二程的历史观 / 66

第一节 史学在二程理学中的地位 / 68

第二节 历史盛衰论和《易传》 / 71

第三节 随时变易以从道 / 83

第四节 二程的学术评论 / 87



第三章 《皇极经世书》和邵雍的历史哲学 / 94

第一节 《皇极经世书》——贯通天人古今的一部著作 / 95

第二节 邵雍的历史哲学 / 100

第三节 《皇极经世书》对史学的影响 / 108

附 宋代古史著作中的上古史观念的发展 / 111

第四章 《资治通鉴》的编撰和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 115

第一节 司马光生平和《资治通鉴》的编撰 / 115

第二节 司马光的“王、霸无异道”的思想 / 118

第三节 历史盛衰的总结 / 122

第四节 司马光的历史编纂学和史科学观点 / 129

第五节 概说司马光的《易》学与史学 / 134

附 范祖禹关于唐史的观点 / 139

第五章 辽代社会与史学思想 / 147

第一节 辽史学的产生、繁荣与嬗变 / 148

第二节 契丹、汉族先民关系认同的历史意识 / 156

第三节 历史的借鉴：辽朝治国安邦的智慧来源 / 162

第二编

第六章 金代史学思想 / 174

第一节 重视历史的民族 / 175

第二节 实录与直书论的争议 / 180

第三节 金世宗时期史学与大定之治 / 188

第七章 郑樵的史学批评和史学思想 / 199

第一节 郑樵治学的特点 / 199

第二节 郑樵的史学批评 / 205

第三节 郑樵的史学思想 / 209

第八章 朱熹的理学和史学 / 222

第一节 穷经观史,以求义理 / 227

第二节 王霸义利之争 / 231

第三节 朱熹的易学与史学 / 239

第四节 朱熹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和文献学思想 / 246

第九章 吕祖谦的史学思想 / 262

第一节 吕祖谦的历史盛衰论 / 270

第二节 吕祖谦的畜德致用思想 / 278

第三节 吕祖谦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和文献学观点 / 283

附 宋代地区性史学特征的形成和浙东史学、蜀中史学 / 288

第十章 王应麟、黄震和胡三省的史学思想 / 298

第一节 《困学纪闻》和王应麟的史考、史论 / 298

第二节 黄震对理学的总结和对历史的总结 / 308

第三节 《通鉴注》和胡三省的史学思想 / 319

第十一章 马端临的学术渊源和史学思想 / 329

第一节 马端临的学术渊源 / 330

第二节 马端临对历史的总结 / 337

第三节 马端临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 349

本卷主要参考书目 / 355

导 言

宋代史学思想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中占有怎样的地位？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把宋代史学和整个中国史学联系起来思考。陈寅恪先生说过：“中国史学莫盛于宋。”^{〔1〕}又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应该说这是从整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做出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在宋代之前有汉唐史学特别是以马班为代表的西汉史学开创出中国古代史学的规模与气象；在宋代之后有明清史学，特别是有清一代史学不但有以考证见长的乾嘉史学，而且还有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和经世史学，其时的疑古史学也都留下灿烂的篇章。因此，理解宋代史学之繁盛，应当从整个文化史的角度深入思考，“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当然我们可以展示两宋的史学繁荣的事实，纪传体史书除新旧《唐书》《东都事略》等外，还出现了继司马迁之后、今天能看到的又一部纪传体大通史《通志》；编年体史书在隋唐经历一个衰退的历程后，到了宋代得到空前的发展，《资治通鉴》这样的史学巨著出现了，并产生相当大的连锁反应，继起的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著作；典制体史书《文献通考》是《通典》

〔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0页。

〔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

〔3〕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

以后的又一部大书；考史一类史书相当发达，金石学形成专门学问；《资治通鉴纲目》创造出新的史书体裁——纲目体，与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并立。《三朝北盟会编》作为当代史著是特别要提到的。地方志、笔记数量多，史料价值相当高。两宋史苑内，绿杨红杏尽争春，美景不胜收，这是明摆的事实，是以前的朝代难得一见的景观。这里就不再罗列了。

仅此，要从总体上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还很难说服人。两宋史学发达要从更深层面上思考，做出解释。

第一节 宋代史学思想的新精神

两宋史学对历史做理论性的思考，和古代经学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只能产生在理学发展的过程中。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称宋代是经学的变古时代，“变古”两字，贴切地说明了宋代学术与前代学术的不同之处，它体现出中国学术在宋代发生了一次大的更新。史学同样发生了一次大更新。

宋代史学思想的明显的时代印记是理性思维的发达。宋代理学的勃兴，是中华民族思维继魏晋玄学之后又一次升华。贯通天人的理性思维对史学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宋代史学思想同样体现出“变古”的特点。大多数史学家具有多重身份，他们既是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代大思想家、理学家。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吕祖谦、李焘、李心传、朱熹、马端临、王应麟等，不只是以史学名世，写出传世的史著，而且在理学史上都是有影响的大师；在《宋元学案》里，他们都有重要的地位。宋代史家群体这样的一身多任特点，造就出独有的史学风貌。他们的史著一般都没有局限在记时叙事上，而是展开了对宇宙、对社会人事、对历史盛衰变化、对社会出路的更深的思考，以探求天人之理。

另一方面是思想家在架构理学体系时，把中国历史放在他们的视野中。他们说“经精史粗”“经先史后”“经本史末”，但并不是抛弃史学。理学作为完整体系，不能不要历史的说明。理学体系形成，对旧经学的破坏和对经旨的发明，离不开史学这个阵地。天理体现在万事万物中，

体现在社会人事中，万物一理，理一分殊，社会人事历史是宇宙变动的一部分，又都受天理的支配。“天”与“人”联系在一起；在有的思想家那里，“人”融化在“天”之中。宇宙万事万物与人类历史联系成一个整体，思想家从理的角度阐明包括历史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变动。可以说，宋代理学家的历史观是古代的大历史观，宋儒把史学思想提升到哲理的高度上。

宋代史学家论历史盛衰，希望再造一统盛世的理念，是宋代史学思想又一引人注目的内容。宋代君王重经亦重史，读经读史、讲经讲史成为风气。宋太祖在军中不惜千金求购经史书籍，太宗诏史馆修《太平总类》，曾要史臣日进三卷，以便亲览。真宗、仁宗、英宗、神宗等，都是关心修史大事的帝王，为的是求治道。张载说自己治学就是要“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希望宋神宗能跻尧舜之治，体现出当时史家的普遍心声。

包括史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亲和力。辽、金、西夏、蒙古的统治者倾慕中原文化，重视搜集和阅读有关的史籍，以求找到可资借鉴的统治方略。他们还仿效宋朝设立史馆机构，编修《实录》。《史记》《汉书》以及《唐书》《贞观政要》等是最受欢迎的书籍。辽圣宗的盛世、金世宗大定之治，都和他们对历史的重视有密切的关系。金世宗很担心子孙忘记自己的祖先，他和他的后人热心宣扬汉文化，大力提倡读《唐书》和《贞观政要》，从这些史书中吸收智慧，收到相当大的成效。金世宗也因此被称作是小尧舜。少数民族的明君在运用历史知识上，相当成功，史学史上应该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当然，这些地区由于理学没有大的建树，史学思想还停留在古今类比的层面上。

分夷夏、辨正统，体现统一的要求。少数民族如契丹，宣称自己是炎黄子孙，从而体现出一种民族族源的认同意识。金人占领地区的汉人也吸收少数民族文化，“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2]。这一时代的民族思想、政治变革观念融会在盛衰论中。宋代《春秋》学中的尊王大一统思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得到发展，为历史兴衰观念做了

[1] 《张子语录·语录中》，见章锡琛点校：《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

[2] 范成大：《揽轡录》，丛书集成初编本。



铺垫，成为其理论的形态。

与上面有联系的是宋代史学家关心社稷命运，体恤民瘼，提倡史学经世。学术有分野，有理学、气学、心学之别，理学有濂、洛、关、闽的差异。在求理的过程中，很多人历经劫难，遭遇坎坷，却没有磨灭追求天理的信念，没有丧失对历史前途的信心，即使是被贬官，讲学也不曾中辍。陈亮的事功之学、叶适的经制之学，都带有强烈的现实感、时代感。即使在南宋后期，朝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史学家、理学家也念念不忘中兴。在朝廷多事之秋，史学家、思想家都努力使学术经世，作有用之文，以天下为己任治史、治学，既不是为仕途升迁，也不是为增殖田产，而只是为追求自己的信念。宋儒的经世观念是中国史学思想的优良传统。

当代史的撰述形成了风尚，除了各朝实录、国史的编写受到朝廷高度重视外，司马光、王偁、苏颂、李焘、李心传、徐梦莘、洪迈、王应麟等，在当朝史撰写上都是有大成就的史学家。方志与地域史的发达，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了史家对现实研究的重视。两宋史家重视写典制体史书，和理学上的经制之学相通，是作为经世之用的。两宋的地区史学如浙东史学、蜀中史学、江西史学、闽中史学和新安史学各有特色，但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不忘恢复编修史乘。应该说，完整意义的经世史学是在南宋形成的。

宋代文化萌发出人文思潮，在史学领域内也看出这类情结，这是研究史学思想史要注意的课题。笔记史料记录社会经济活动以及科技知识，同时反映出都市生活的场景，写出市井细民的心态，成为史部书的新的方面军。代表性的作品，有沈括的《梦溪笔谈》，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洪迈的《容斋随笔》，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

在都市中的瓦子勾栏中，讲史是说唱曲艺的重要内容，它分唱、说两大类，“说”即说书，有讲史、讲经、小说与说浑话四种。讲史是“讲说前代史书文传兴废争战之事”^[1]，传播历史知识，宣传历史观念。如

[1] 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果说有俗文学之类，那么也可说有俗史学，这是都市文化兴起的一大特色。它突破了传统史学形式，是人文精神萌发中的现象。下层百姓、市民通过讲史说书，宣传忠义节气观念，表达出对国家社稷前途的担忧，对腐败的愤恨，对违背人性道德的抨击，其中也夹杂纲常伦理的说教。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讲史话本的出现，通俗史学作品的繁荣，透露出时代文化的一缕新气息。

两宋 320 年的学术，一变于仁宗庆历之际，再变于南宋孝宗乾淳时期。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即所谓的“中兴四朝”结束，南宋学术进入到后期。宋、辽、金的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形成两个大的时段，北宋九朝是一个大时段，其间宋仁宗庆历年间是个分界线，此前是宋代史学思想史的第一个阶段，这以后的史学思想是第二个阶段。史学思想发生变化，根源于社会政治变动，也是理学兴起所造成的局面。

“靖康之难”，宋室南渡，整个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动。宋孝宗与金世宗时期，中国南北创造出相互辉映的史学文化。“隆兴和议”后，宋金并立，在几十年的相对平静的环境中，由于“乾淳诸老”的创造，出现了学术繁荣的局面。朱学、陆学、吕学，鼎足而三；湖湘之学也是有影响的学术一大宗。经制之学、事功之学展示出史学的活力。史学思想也是大发展的时期，南宋史学思想变化，以理宗为界划分成前后两个时期。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是宋代史学思想史的第三个阶段。金代史学思想相当活跃，借鉴史学观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从理宗到南宋灭亡，是宋代史学思想史的第四阶段。理宗时期，朱学地位上升，南宋统治走下坡路，一蹶不振；理学逐渐成为教条，失却了原先的创造性活力。朱、陆门人相互出入，无论朱学还是陆学都没有熔铸为新思想，形成新的学理，以使学术再一次升华。朱学与陆学混杂，朱学流于训诂，陆学流于禅。这些都影响到当时的史学变化。史学在保存文献以及文献训诂考证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发明春秋史法、史例，进而改写史书，史学在校节上有一些进展；但在史学思想上没有增添新的内容，反倒是逐步走向虚脱。在当时条件下，民族的节义观表现突出，宋代末年的黄震和元代前期的大宋遗民中的史家如胡三省、马端临，他们在史著中留下了自己的心迹。

宋代史学思想史经历了一波三折，留下值得深思的问题。